

叙事传播的疾病隐喻及其发生发展机制

◎ 王强

(闽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在叙事传播实践中, 故事就像传染病一样扩散, 二者的发生和运作机制十分相似。透过“病毒感染”这一隐喻, 可以很好地探究叙事传播的现实表征与理论逻辑。情绪连带与认同是故事病毒式传播的关键。叙事传播扎实地立足于人的身体与感性的基座上, 凸显了叙事传播机制的身体性。伴随着巨大情感能量的叙事行为, 满足了人类表达意义、建构自我认同、理解和解释世界以及增强社群团结的需要。故事在重述和流传过程中像病毒一样不断发生变异, 叙事参与成为主体赋权的过程, 个体以此获得意义表达、情感连带和叙事抗争的权力。

【关键词】叙事传播 叙事认同 疾病隐喻 病毒感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6-060-06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6.010

在传播学史上, 彰显叙事重要性的理论研究并不醒目。长久以来, 理性、实证色彩鲜明的信息传播观念塑造了人们对传播学的想象。克劳德·香农的“传播数学理论”被认为建构了传播学的起源迷思, 这一起源神话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传统。这一传统对凸显情感维度的叙事传播研究施以无形压力, 使之长期受到遮蔽。晚近以来, 叙事传播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其致力于对传播学的理性传统进行反拨, 以彰显人的主体性。

当下, 推进叙事传播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探索叙事传播及认同的运作机制。西方叙事传播研究中新兴的“叙事运输”理论, 借助“叙事即旅行”的隐喻, 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模型, 提供了一种理解叙事传播和说服的思维框架: “叙事的旅行隐喻强调叙事作为旅程或‘通道’的动力作用。旅行者在作为旅行地图的故事世界中, 以情节作为旅行路线, 由于阅读了故事而被故事带到别的地方。……沉浸在故事中就意味着脱离世俗现实, 进入另一个叙事世界。叙事运输将其对象引

入被讲述的故事中, 并允许暂时逃离。”^[1]叙事运输意味着将故事接收者运送到虚拟的故事情境中, 时空转换带给叙述接收者一种沉浸性的审美体验。有别于“叙事运输”理论, 本文拟提出一种以叙事即病毒感染为核心的新的隐喻结构, 以彰显叙事传播和认同机制的身体性, 以及故事流传和重述过程中的变异性, 为厘清叙事传播的发生发展机制提供一个全新的阐释框架, 以推进叙事传播学的学理建构。

一、身体性: 故事的病毒式传播机制

1. “感染”: 从医学术语到审美话语的迁移

1994年,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在《媒体病毒: 流行文化的隐秘议程》一书中, 将生物病毒扩散和大众传播进行类比, 较早地讨论了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中的病毒式传播现象。在他看来, 媒体病毒的传播机制与生物病毒扩散极其相似, 它会改变感染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我们必须承认, 引发社会恐慌的媒体事件不仅

作者信息: 王强(1979—), 男, 山西大同人, 博士, 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传播学与叙事学。

仅是简单的特洛伊木马，他们是媒体病毒。这个术语并非用作隐喻：这些媒体事件不像病毒，它们就是病毒。……一旦被感染，病毒就会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将其更隐蔽的议程注入数据流，我们现在称之为模因。就像真正的遗传物质一样，这些模因渗透到我们做生意的方式、教育自己的方式、相互作用的方式——甚至是我们感知现实的方式之中。”^[2]病毒式传播的特性，一方面表现为病毒信息在“感染者”之间自发和自动扩散，传播速率快、范围广，往往呈现为指数级的爆发式传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感染者”的影响显著，风行一时的公共叙事往往成为改变个体观念和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罗伯特·希勒看重叙事经济学的缘由：叙事的病毒式传播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传播性的大众故事”足以改变经济运行的轨迹，因此说它开启了一种新的经济变化理论实不为过。

在探讨病毒传播机制时，克莱默尔指出，“感染”现象可以在医疗、技术、社会和审美等诸多层面得到体现。感染一直被作为隐喻应用于艺术与审美领域，用以表征人在审美体验中产生的生理、情感等身体变化的过程。不管从哪个层面来看，身体性都是“感染”的突出表征，这也是它从医学术语迁移到审美话语的关键：“传染的一个特征是感染过程的明显的身体性。从生物学和技术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病原体只能通过接触传播，而感染会导致受感染的身体发生转化。因此，在非生物环境中使用感染的概念，则总是与心理主义、理性主义或‘脱离肉身的’概念的影响背道而驰。”^[3]叙事传播带来的感染力量，之所以会对人产生显著而深刻的影响，就在于这种审美感染建立在身体的、情感的经验基础之上。在这种叙事接收过程中，受众全身心沉浸于具体生动的故事情境当中，移情效应非常明显。换言之，和理性的信息论相比，叙事传播扎实地立足于人的身体与感性的基座上，它和病毒感染类似的地方在于凸显了传播机制的身体性。

2. 情绪感染：故事像传染病一样扩散

在情感社会学研究中，情感被视为文化、社会结构、认知和生物力量复杂互动的结果，生物性是人类情感不容忽视的重要特质：“人类的许多行为能力，比如产生情感，是固化在人类身体系统之中的，因此，不能仅仅把情感解释为文化的社会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并且，情感的生成是皮层（此区域与语言和文化有关）与皮层下（此区域是情感最初的发源地）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4]情感的产生与激发伴随着人的生理调动与唤

起的过程，这赋予情感传播以坚实的生物性基底，为其社会分享或扩散提供了不竭的驱动力。情绪传播理论认为，能够产生心理唤起的故事会在社交网络中传播，而具有更大情感影响的故事更容易被分享。情感表露往往具有传染性。了解他人的创伤可能会导致二次创伤，创伤故事的听者也会出现噩梦、疲劳、抑郁和其他情绪创伤的症状。^[5]叙事传播的过程，往往是人们情绪互相感染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很容易形成病毒式扩散的结果。

关于病毒式传播的研究表明，具有感染性的内容是决定病毒式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为了获得病毒式传播，病毒式讯息应当具有明显的感染性。情感因素是病毒式讯息感染性的关键，是病毒式讯息的触发器。”^[6]叙事的病毒式传播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客观理性的信息，人们更愿意倾听有人情味的故事。换句话说，每个人几乎都对饱含情感的故事缺乏免疫力，都可以归入故事的易感人群。正因为人们极易产生由故事带来的情感共鸣，进而成为“故事病毒”的“感染者”，并自发地将其“病毒”扩散出去，最终形成叙事的病毒式传播。由人们情感互动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强烈而持久的，甚至成为形塑历史的重要推动力。罗伯特·希勒在论述历史和叙事的密切关联时指出：“1837年一则新闻报道了愤怒的暴徒在伊利诺伊州奥尔顿枪杀主张废奴的报纸编辑洛夫乔伊一事。这个带有煽动性的故事将北方的反奴隶制情绪推向了狂怒。除非我们将相关叙事的情感力量纳入考量，否则，有关美国内战在何种程度上因奴隶制而起的学术讨论就不可能得出确凿的结论。”^[7]事实上，这种叙事的病毒式传播往往是美国历史上重大种族冲突骚乱的导火索。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非洲裔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遭遇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事件现场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美国舆论强烈反应，大规模街头抗议随即爆发，并在全美各地和西方世界持续发酵。弗洛伊德的悲剧故事是美国种族问题的缩影，点燃了美国黑人民众心中积蓄已久的抗争怒火，对于美国现实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叙事共同体：基于情感互动的叙事认同

1. 叙事本能：叙事认同的内在驱动力

对于人类来说，叙事的需求不可或缺，它源于人类的语言本性，建立在群体生活的基础之上。叙事在共同体成员中唤起相似的情感反应，持续建构并巩固特定

的政治或文化共同体。叙事是人类情感互动、群体凝聚的重要方式。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形象地把人类的语言叙事、八卦闲聊类比为动物之间相互梳理毛发的行为，人类讲故事的目的旨在创造一种群体感，并由此凝聚自己人的共同体：“讲述一个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者是关于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或者是关于生活在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甚至可能是关于一个没有人真正经历过的灵性世界，所有这些故事，都会创造出一种群体感，是这种感觉把有着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重要的是，故事还能使我们明白，生活在旁边那条峡谷里的人们是否属于自己人，是否可以和我们同属一个群体。”^[8]基于语言和叙事的建构，人类沟通交流、协力合作，成为情感密切联结的共同体。

叙事建基于人类的生存本能，具有生物学上的重要意义，其价值超越了消遣娱乐的层面：“叙事能够娱乐人心、让人快乐，其实只是额外的效果而已，人之所以喜欢叙事，其实是在做一件生理上重要且有益于我们的事，至少在数百万年前曾经如此。”^[9]叙事与人类的自我认知、群体凝聚以及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的思维与心理机制受到叙事的深刻塑造和影响。在神经系统科学与认知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马克·特纳在《文学的心灵》一书中指出：“叙事想象——也就是故事，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构件，理性的能力依赖于它。叙事是我们展望未来、预测、计划和解释的主要手段。它是人类认知所必需的一种文学能力。心灵本质上来说是文学性的。”^[10]叙事能够让大脑神经元兴奋起来，并将思想和感觉的片段连接起来，通过组装和拼合各种元素，建构完整的情节链条，进而满足人类探寻意义的需求。人类大脑的叙事本能，赋予叙事传播以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使得叙事的流行与扩散具备了坚实的生物性座架。

作为传播的叙事，应当关注故事的传播价值，讲求传播效果。能够引发病毒式传播的故事是值得讲述和倾听的，其无疑具备极大的叙述潜力，可述性比较强。对可述性的评判，不同主体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对其进行综合考量：“叙述是否能引发兴趣，是由三个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是所叙述的事件本身是否异常；二是如何说，即叙述的方式造成文本叙述性；三是‘阐释社群’的理解方式与认知满足。这三个环节都是相对的、机动的，只有配合起来成为一个符号表意环链，才会起作用。”^[11]叙事活动卷入传播和接收两端，有效的叙事传播链条得以形成，关键在于求得阐释社群的认

同。虽然叙述行为看起来是由讲故事者主导的，但是叙事必须依赖听者才有意义。特定故事的阐释社群，实质上是具有情感认同的故事共同体。由故事建构社群，这当中必然卷入身份认同与权力政治的竞逐，是区隔“我们”和“他们”的表意实践。这种利用叙事认同进行的共同体建构活动在政治宣传与文化传播中司空见惯，身处其中的人们早已习焉不察了。

2. “转录”“循环”与“移情”：叙事认同的疾病隐喻

在故事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合作学习，共享情感，传承共同的历史与文化，在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上保持一致。故事的情感连带机制让人与人之间彼此影响，相互塑造，弭平差异，抱团取暖。“故事可以说是信息代码的载体。讲故事的意向是让人模仿、复制、共享和效仿。故事是如何思考和思考什么的分配机制。故事储存教益，使社会学习跨越时代、语言和地理疆界，复制归纳逻辑的顺序。”^{[12](72)}经由这种复制和模仿，故事共同体的成员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不断趋同，成为稳固的文化社群。这一叙事认同过程非常类似于疾病传播中病毒的复制与感染。克莱默尔从生物病毒和技术病毒的角度讨论感染，转录被揭示为传播的中心机制。而叙事传播活动实质上也展现了一个转录的过程，从而将传播与认同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叙事传播与疾病感染在表现形态上具备相似性的又一重要表征。

在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中，扬·阿斯曼将文化定义为“一个集体的免疫系统”，其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循环”：“共同拥有的文化意义的循环催生了一种‘共识’，即在集体的每个成员心目中都形成了一种整体高于一切的认知，而成员作为个体的愿望、欲望和目标都要服从于整体。”^{[13](146)}故事在一个集体或共同体内引发情感共鸣，进而产生病毒式传播，其实质就是共享价值观或文化意义在集体内的循环。集体成员对这种共享文化普遍“易感”，而对与其价值观或信仰对立的文化则容易产生排斥心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免疫”。在论述故事与亚部落建构的问题时，约翰·哈特利和贾森·波茨也透过免疫学的视角指出，外群体的知识通常被视作“异物”，这种文化的结群性使得新思想难以被获取和接受。^{[12](93)}这种文化的免疫屏障，强化了集体认同，分隔开了不同的文化社群，无形中为特定故事的跨文化传播设置了障碍。

在叙事运输理论中，说服和认同机制的根源在于接收者在沉浸于故事情境时的角色代入：“当认同一个

角色时，故事接收者会沉浸在文本中，以致其自我意识削弱，他们会将自己想象成这个角色，对角色产生情感同理心，以及在故事中采用角色的目标和观点，产生认知同理心，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11]这描述的其实是叙述接收者在故事情境中的移情表现。而现代神经科学关于“移情”发生机制的研究表明，移情是基于人类大脑镜像神经元系统的运作而被动发生的，这样就将移情发生机制的研究推向人类生物机理的应激性层面，使之成为硬科学研究和处理的课题。斯蒂芬·达沃尔将移情的形态划分为逐步递进的层次，而基础层次就是情绪感染式移情：“它表现为人们被动性地感受到他人的感觉或情感状态，在这种移情形式中并没有主动的‘想象力的投射’。”^[14]虽然叙事认同中的移情并非只是单一的自下而上的本能反应过程，但情绪感染的发生机制却使其更加类似疾病感染的过程。这样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在叙事认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样体现了叙事传播的身体性。建立在生物机理和神经构架之上的情绪感染式移情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构成了人类亲社会行为的基础和根源。由此可见，与叙事运输理论相比，疾病隐喻框架显然能够更加直观地揭示出叙事认同的发生机制。

三、故事重述：模因变异与主体赋权

1. 情感能量：情感的“病毒载量”与叙事权力的建构

故事在公共空间的流行及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让拥有传奇经历或者善于讲故事的人拥有了一种意义输出和话语权掌控的潜力。这让那些履历乏善可陈或者拙于叙事的人自愧弗如。对于个体的自我认同来说，能体现自我价值的故事不可或缺，否则就会沦为罗伯特·弗尔福德命名的“故事贫乏者”：“一个人因为缺少一个好故事而受挫，这种念头是有些辛酸的。还没有术语能形容这种情况，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叙事匮乏，也可以说这个人是个故事贫乏者。”^[15]如果把叙事匮乏这一概念加以引申，可以将其理解为特定主体叙事话语权缺乏的表现。这种叙事权力涉及叙事与传播两个方面：拥有好故事或善于讲故事固然重要，而将故事传播出去并产生影响则更为关键。

在叙事传播活动中，具有影响力的故事讲述者往往具备叙事权威和劝服能力，占据公共空间，掌握公共舆论话语权。而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讲故事的意义重大，被视为一种取代蛮力的领导才能：“和其他天然能力比

如烹饪或打仗的能力一样，讲故事的才能是任何种群里随机分布的能力；同时，它又集中在有‘发号施令威望’的人中，并为他们服务。”^{[12](42)}叙事意味着劝服和影响他人，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展现。按照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互动在权力和地位两个维度上都是分层的，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平等的，所具备的“情感能量”也是分层的。这样一来就将社会分层问题的焦点转移到情感上面：“我们可以将社会分层想象成不是谁拥有什么样的物质资源，或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了什么抽象的位置，而是情感能量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分层的最简单形式就是具有能量的上层阶级，统治着消沉的下层阶级，而中间是具有中等能量的中产阶级。”^[16]虽然柯林斯强调互动仪式的身体在场性，但伴随着互联网等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在线情感互动的模式日新月异，网络社群的情感连带与相互感染易于实现，越来越多的人在虚拟和想象的故事共同体中寻求身份认同。不论线上还是线下、虚拟还是现实，叙事活动参与者的情感能量、符号资本和话语权力都存在显著差异。堪称能量明星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掌控公共叙事，引发群体中情绪的相互感染与情感能量的扩散与流动。如果把情感能量与病毒载量做类比可以发现，叙事传播中的情感互动与病毒传播的扩散机制非常类似：病毒载量大的超级传播者向广大易感人群传染疾病，病毒载量小的个体（如无症状感染者）则无法获得较高的传染率。

2. 故事流传：文化模因的复制与变异

在病毒传播过程中，一方面，被感染者与传播者会产生相同或相似的病理征候；另一方面，不断传播的病毒可能持续变异，导致被感染者出现新的症状。而在叙事传播过程中，故事的形态和面目也在不断流传中发生变异。这种文本复制和传播过程中变异的现象，可以置于模因论的视域中加以考察。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模因概念，用来阐述人类文化进化演变的机制。与生物进化过程中基因的自我复制相似，人类的思想文化通过模因的复制、模仿而得到流行和传承。模因传播的过程与病毒的复制类似：“如果你在在我的脑海中植入一个可繁殖的模因，就会寄生在我的大脑里，把它变成传播模因的媒介，就像病毒寄生在宿主细胞的遗传机制一样。”^{[17](192)}基于此，理查德·布罗迪把模因比拟为大脑病毒：“大脑病毒是一种用模因感染人的东西。这些模因反过来影响被感染者的行为，从而帮助病毒延续和传播。”^[18]模因通过模仿的方式自我复制，在传播过程中相互竞争并持续发生变异：“模因以

改变的形式传递给你。……看起来模因的传播受到持续变异和相互混合的影响。”^{[17](195)}在辗转流播中，思想观念和文化文本不断变换自身表现形式，并与其他文本相互混杂，使得人类文明在传承与变革中前行。

事实上，故事就是人类文化模因的一种重要形态，一些影响深远的原型故事以多种形态反复出现在人类叙事的场景中，成为人类思想和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故事在不断重述的过程中得到流传，变异的发生在所难免。经典故事的改编层出不穷，“本事迁移”赋予经典文本以生机和活力。“因为讲故事总是重述一个故事的艺术，当故事不被保留，这一艺术也就丧失了。它之所以丧失，是因听故事时，人们不再罗织细节，喜欢往其中附加林林总总的个人经验。听者越是能通过故事来呈现自己，那么，故事的内容就越能深深地记忆上打下印记。故事的韵律牢牢地抓住了他，听着听着，就有想要去重复讲述这个故事的冲动，重述故事的才能才会自动化为他自身的禀赋。这就是讲故事的艺术得以不断繁衍、发展的人们的情感脉络。”^[19]换句话说，故事的生命力就在于重述，只有这样它才能以“活态”的方式留存于世。

3. 叙事参与：叙述竞争与主体赋权

重述故事的人，一方面促进了故事的传播，扩大了原故事讲述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将个人立场和价值观融入故事中，由此谋求自身的叙事权力。由此可见，重述故事实质上是一个通过叙事进行主体赋权的过程。故事凸显讲述者和听者的主体性，更富于人情味和感染力，更符合人们的审美需要。而通过叙事来突出叙述参与者的主体性，毫无疑问也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在故事的叙述及重述的过程中，主体的声音和情绪得以充分彰显，赋予叙述参与者意义表达与情感连带的权力。

在论述叙事变革对于人们身份构建和认同的重要作用时，伯特伦·科勒和菲利普·哈马克提出“叙事参与”的概念：“叙事参与的过程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有能力从内部对主导叙事的内容进行竞争，并在这个过程中潜在地否定和重新制定故事情节。因此，叙事参与代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过程，它可以催化集体行动，以促进社会变革。”^[20]这种“叙事参与”意味着自我赋权的个体要在故事重述过程中展开话语权的争夺，并以有效的叙事传播消解和对抗公共空间的主导叙事。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变革赋予叙事参与者更大的自主权。故事的重述与再传播变得轻而易举，跨越媒介和体裁的故事变异持续发生。一个病毒式扩散的故事漂

流在互联网的汪洋大海，经历种种增生、戏仿、变形、裂解、扭曲、拼贴、耦合等变异，不断转换其形态和面目，衍生出千变万化的文本，在不同社群激起各种情感反应，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故事世界。虽然互联网世界看起来众生平等，但主体之间的符号资本并不均等，由此导致叙述参与者的“符号权力”存在显著差异。换句话说，由于叙事参与者的符号权力并不均等，所以普通大众往往居于被动感染者的处境。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媒介科技的发展虽然赋予普通人意义表达的自主权，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信息的自由高速流通也可能进一步湮没作者的形象和声音。对于故事的病毒式传播来说，这意味着一些流行的叙事往往无从溯源，并可能减弱故事变异的程度，以及增强故事之间的相关性和相似性。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要复活故事作者，彰显叙述个体的自主性，需要面对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新挑战。

4. 重复与颠覆：故事重述中的经典建构与解构

在集体或族群的建构过程中，历史故事或起源神话不断被重复，构成了所谓的历史意识或历史感。故事的重复对于集体或族群的建构及历史传承至关重要：“每个凝聚性结构的基本原则都是重复。”^{[13](7)}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集体或族群的文化记忆凝结在正典和经典中。那些不容亵渎和篡改的经典故事，依托于政治或宗教的力量而受到顶礼膜拜，经由不断重复而巩固了自身地位。但是，经由故事塑造的文化记忆不是绝对稳固的。记忆具有政治性，它是现实政治的投射，因而充满了主体之间权力争夺的印记。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记忆可以区分为“有人栖居的记忆”和“无人栖居的记忆”两种，也称为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功能记忆是主体对回忆内容进行选择、编排和意义建构的结果，体现为一个故事化的过程，其建构伴随着“合法化”与“去合法化”的权力斗争：“反面回忆和官方回忆一样具有政治性，因为两种回忆都是为了合法化和权力。”^[21]正统的历史叙事常常面临来自反对力量的挑战，反面的故事重述对正统叙事予以解构和颠覆，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情节脉络。就像病毒变异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新型病毒一样，这种抵抗性重述将正统叙事消解得面目全非，并建构了新的历史叙事。

结语

伴随着20世纪后期“情感转向”潮流的兴起，人们赋予新闻舆论和公共领域中的情感以更多正面的价值。

长久以来横亘在情感与理性之间的鸿沟被消解，情感在大众传播和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新评价。借助情感认同的力量，叙事在资讯传播、文化传承、社群凝聚、政治动员和广告营销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叙事的价值得到充分确认，叙事传播的领地不断扩张。透过叙事展开的博弈和竞争，在塑造现实格局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媒体融合的当下，媒介之间的传统壁垒被拆解殆尽，故事在高度聚合的媒体平台上流转、扩散，超越特定媒介的叙事传播理论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叙事传播与叙事认同领域的生动实践必将持续推动叙事学和传播学的交叉融合，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

参考文献：

- [1] 陈先红, 杜明曦. 叙事运输理论: 隐喻、模型与运用[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4): 78-87.
- [2] Douglas Rushkoff. Media Virus! Hidden Agendas in Popular Culture[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6: 9-10.
- [3] Sybille Krämer. Medium, messenger, transmission: An Approach to Media Philosophy[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106.
- [4] 乔纳森·特纳, 简·斯戴兹. 情感社会学[M]. 孙俊才, 文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6.
- [5] Harber, K. D, Cohen, D. J. The Emotional Broadcaster Theory of Social Sharing[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24(4): 382-400.
- [6] 冯丙奇. 病毒式传播研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70.
- [7] 罗伯特·希勒. 叙事经济学[M]. 陆殷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15.
- [8] 罗宾·邓巴. 人类的演化[M]. 余彬,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274.
- [9] 维尔纳·锡费. 叙事本能: 为什么大脑爱编故事[M]. 管中琪, 译. 台北: 如果出版社, 2019: 69.
- [10] Mark Turner. The Literary Min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
- [11]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169-170.
- [12] 约翰·哈特利, 贾森·波茨. 文化科学: 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M]. 何道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3]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4] 王嘉. 神经科学与西方道德心理学视野下的移情、同情以及共同感[J]. 云南社会科学, 2014(1): 50-55.
- [15] 罗伯特·弗尔福德. 叙事的胜利: 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M]. 李磊,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29.
- [16]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89-190.
- [17]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8] Richard Brodie. Virus of the Mind: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eme[M]. London: Hay House UK Ltd, 2009: 16.
- [19] 瓦尔特·本雅明. 单向街[M]. 陶林, 译.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8: 232-233.
- [20] Phillip L. Hammack, Bertram J. Cohler. The Story of Sexual Identity: Nar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Gay and Lesbian Life Cours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55.
- [21]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52.

The Disease Metaphor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WANG Qi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stories spread like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ir occurrenc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are very similar.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virus infection", we can explore the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identity are the keys to the viral transmission of stories.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is firmly based on human body and sensibility, highlighting the "bodily attributes"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The narrative behavior with great emotional energy meets the needs of human beings to express meaning, construct self-identity,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world, and enhance community unity.

Keywords: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identity; disease metaphor; virus infection